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第四期

陳百年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系

### 試論二戰前蘇聯外交政策之雙重性

####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蘇聯意識型態的理論之矛盾性，試圖闡釋二戰前蘇聯的外交政策演變，解釋蘇聯特殊的政治體系與馬列意識型態如何影響該國的外交政策，以分析戰前蘇聯對外政策為何具有雙重性，藉此以釐清其對外政策之雙重性，並且希冀能從二戰前蘇聯的外交雙重性，將蘇聯外交政策作一整體性、長時間的分析。吾人以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內在雙重性，使得蘇聯在整個國際環境中得以靈活運用其意圖與雙面手段，由於其政策利用得當使得蘇聯一直佔有其在國際事務上的特殊優勢。雖然蘇聯現今已經瓦解，但因為其外交政策有其時代與國家性質的特殊性，因此仍值得對此問題加以研究與釐清，以期對蘇聯體系與意識型態有所理解與進一步的探索，以釐清共產極權國家的意識型態與其在政治運作的實際環境有何關係與連結性，兩者是否相合或相悖是否造成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為其實際政策的中新理念或只是行動上的掩護工具。

關鍵詞：極權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意識型態、世界革命論、一國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史達林主義、官僚政治體系。

## 一、前言

蘇聯的興起，使得馬克思主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具有擴張性的政治力量，對日後的國際政治與國際局勢發生極大的影響，雖然日後蘇聯已經垮台瓦解，但仍可對其共產時代與作為加以研究。蘇聯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為何？實踐其對外政策的手段為何？這些正是研討蘇聯對外關係的主軸。本文主要所要探討的問題，即是蘇聯對外政策及實踐是爲了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倡的「世界革命」或是追求傳統的「國家利益」呢？關於前者，可以引述繁多的蘇聯官方文件予以支持，從早期列寧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人民」的呼籲<sup>1</sup>到蘇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一九八一年）所發表的官方基本文件中處處可見，不勝枚舉。另一方面，很多事實又證明，蘇聯以追求「國家利益」爲主，例如一九一八年爲了與德國停戰而簽訂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一九三九年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蘇聯的外交政策自冷戰後已有許多相關著作討論，其中尤以美國蘇聯問題專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最爲精闢，肯楠曾對蘇聯外交型態問題作一番研究，清楚地制訂冷戰時期美國對蘇外交的主要中心信仰，他的〈困蘇論〉（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sup>2</sup>與〈格蘇論〉（America and the Russian

<sup>1</sup>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一卷，653頁。

<sup>2</sup> 〈困蘇論〉原名‘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載於美國的《外交季刊》一九四七年七月號。困蘇論的主張，認爲蘇維埃的世界革命理論和其強權如果受到圍堵，使其無法擴展其力量，必然會發生內變，他們理論的信念必然會改觀，而霸權的本身也會變質，方能適應新環境，以求自保。

Future)<sup>3</sup>即爲其代表作，亦爲美國圍堵政策的外交藍圖，在此兩文中，對於戰後蘇聯的政治體系與外交手法皆有一精闢的分析理論<sup>4</sup>。在戰後各家著作中，對於蘇聯對外政策的本質，各家說法不一，大致上可歸納爲三種：第一種說法強調延續性，持此說法者大部分爲西方國家的學者，認爲蘇聯對外政策乃是沙皇俄國對外擴張政策的延續，其中心是「國家利益」，其特點是向外擴張，而「不斷擴張」是沙皇俄國與共產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常數，認爲地理位置與歷史經驗決定俄國國家的基本利益，不因其政權而有所改變，強調俄國追求安全、接近海洋、在亞洲的命定擴張（manifest destiny）、與領導斯拉夫民族的持久目標，認爲蘇聯對外政策是權力導向的。第二種說法強調意識型態，持此說法者大部分是蘇聯、中國大陸、第三國家的學者，認爲馬列主義爲其對外政策的中心思想，並且是主宰世界的藍圖。他們主張蘇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建立世界共產主義與世界霸權，蘇維埃領想要創造一個世界共產體系，並視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爲持久的衝突，直到一方勝利才會停止敵對的關係，蘇維埃所有的行爲都旨在推動世界革命，因此西方與蘇連達成協議並無益處，認爲蘇聯對外政策其中心是「世界革命」，其最後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第三類看法綜合了前兩種的看法，認爲蘇維埃的外交政策結合傳統與意識型態的特徵，影響蘇聯對外政策的因素包括：俄國的地理位置，尋求戰略安全邊界的俄羅斯

<sup>3</sup> 〈格蘇論〉原名‘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載於美國的《外交季刊》一九五一年四月號。格蘇論的主張，認爲美國應該要以身作則，成爲世界自由的表率，使鐵幕國家的人民知道自由的可貴。肯楠又強調預定解救俄人的方案爲作戰目的，竭力宣傳，使其爲自由解放的聖戰。

<sup>4</sup>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文中認爲蘇聯對民主仇視是蘇聯國內結構的副產品，說明即使西方採取求好緩和的政策，蘇聯亦不爲所動的原因，與外在世界的緊張是共產主義哲學中的本質，而且也是蘇聯國內制度運作的本質。就其國內而言，黨是唯一有組織的團體，社會的其他部門只是黨的附庸，因此蘇聯對外在世界難以解決的敵意乃是企圖把國際事務轉爲符合國內政治利益的手法。

擴張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論，外來的挑戰性衝擊……等因素。認為蘇聯的外交政策起初以革命的信仰與意識型態最為優先；接著實際的民族主義升高，因為蘇維埃的領袖改採基於權力、地理、與歷史的比較保守政策。各史家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著作大多偏重於分析蘇聯二戰後外交的冷戰體系，對於其二戰前外交政策則較少分析<sup>5</sup>。

本文試圖對二戰前蘇聯外交政策作一整理與分析，試圖找出二戰前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軸。本文之所以選擇以「意識型態」的切入點來討論二戰前蘇聯的對外政策，吾人在研讀《大外交》一書時，發現蘇聯的外交行動與其宣傳是相互矛盾的，吾人以爲其矛盾之根源，可能是因爲蘇維埃的政治理想與政治行動互相矛盾，而蘇維埃的政治理想<sup>6</sup>即是「世界革命」。綜觀蘇聯歷史，吾人以爲「世界革命」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在蘇共政權的初期比較強烈，其理論矛盾以較無法協調，本文將以蘇聯意識型態的理論之矛盾性，試圖闡釋二戰前蘇聯的外交政策演變，解釋蘇聯特殊的政治體系與馬列意識型態如何影響該國的外交政策，以分析戰前蘇聯對外政策爲何具有雙重性，藉此以釐清其對外政策之雙重性，並且希冀能從二戰前蘇聯的外交雙重性，將蘇聯外交政策作一整體性、長時間的分析。對於蘇維埃的政治理想與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以「行爲學派」<sup>7</sup>的方法來論證，爲避免失之主觀，而將引用大量的歷史事實或言論以旁證，希冀能盡量做

<sup>5</sup> 參考 David Mackenzie, Michael W. Curran 合著，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編譯館，民 84 初版），頁 907。

<sup>6</sup> 「政治理想」在本文的定義是：對於一個社會可以提供一套基本的道德價值，做爲個人和社會的行動標準，特殊的行動或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必須受這些價值機動聯想作用所證明。「政治理想」一詞是敘述一套特殊的制度、目標和方案，是一套人們可以拿來作爲生活目標的概念與名詞的集合。

<sup>7</sup> 行爲學派概括來說，是認爲思想爲一切行動之動因，理想與行爲之間有密切的交互動作，它們會彼此交互的影響彼此。

到客觀分析「蘇俄的政治意識型態如何影響外交政策」這一問題，本文將在第三章與第五章裡處理該問題。對於蘇俄的共產理論與意識型態問題，過去已有不有成果，大致上問題圍繞在「史達林主義是否爲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爭議上，這個問題長期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者與其批判者之間，且因個人的立場、看法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答案，本文將在第四章裡，針對史達林之「一國社會主義」其對外態度而加以分析<sup>8</sup>。本文將討論的重心圍繞在「意識型態如何影響蘇維埃對外政策」問題上，吾人礙於學識之不足，可能會有過於誇大「意識型態」的重要性，而犯下「以偏蓋全」的問題，著文時會盡力避免，以免會犯下錯誤。

<sup>8</sup> 例如，托洛斯基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被出賣的革命》，就依據十月革命的精神來揭發史達林，意圖從「史達林的墮落」中救出十月革命及其靈魂——布爾什維克主義；反之，索忍尼辛的「尼古拉群島」則認爲馬克思主義是必須爲史達林時代的大肅清、集中營負起責任的最後承擔者。I. Deutscher 認爲 Carr 將列寧視爲建設蘇維埃圖像的指導者，將內在於列寧思想或列寧主義的理想主義要素，當作是附屬性的東西，因而把從列寧到史達林的歷史過程當作是連續性的過程。I. Deutscher 認爲，E. H. Carr 過於強調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連續性」，而忽視其「本質上的差異」。換句話說，I. Deutscher 認爲 Carr 沒有正確把握理念或思想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把不再將「革命理想主義規定歷史人物的行爲」視爲圭臬的史達林時代視同於列寧主義時代，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透過史達林主義的「菱鏡」(prism)來觀察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這個問題，其根源在於 Carr 研究蘇維埃國家的旨趣，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關心固然重要，但卻不是首要的目的。對於 Deutscher 的批判，Carr 雖然認爲 Deutscher 在歷史認識上似乎過於強調理念要素，忽略了「現實的考慮往往支配政策」這一面向，但也承認「革命難以忘懷鼓舞著他的烏托邦夢想」的事實，Carr 在其共四部的大著《蘇維埃俄羅斯史》的最後一部〈計畫經濟的基礎〉中，修正了自己過去的想法，發覺存在於列寧與史達林之間的鴻溝，他表示「史達林版工業革命的手段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革命本來的觀念』」，因而做出「史達林的工業革命是革命，但同時也是反革命」的結論。這就是說，Carr 曾經透過史達林主義的稜鏡來看馬克思主義，但到了晚年，就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準來評判史達林主義一批判史達林版工業革命的非人性性質。

## 二、簡述戰前蘇聯對外關係

蘇聯政權在一九一七年成立之後，馬上面臨到四個極需解決的問題：和平問題<sup>9</sup>、內戰問題<sup>10</sup>、外國干預問題<sup>11</sup>、革命輸出問題。此時俄國境內內戰

<sup>9</sup> 自從德國對蘇俄提出停戰條件之後，在人民委員會議和中委會，發生了激烈的和戰辯論。布哈林贊成拒絕德國條件。他說：「俄國革命如果只是爲了自救，那是不榮譽，如果接受德帝國併吞領土的事實則被判了德國人和國際的社會主義。德國若與俄國和平，德皇威廉二是就有自由的手與德國內的革命戰鬥。……縱使繼續戰爭爭至於戰敗和消滅，它比不名譽的和背叛的活著還要好些」。（原引不詳，轉引自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60。）社會革命黨左派擁護布哈林的觀點。列寧認爲這種主張是出於感性衝動的，他努力說服他的同事們，瞭解到軍事局勢的完全絕望與繼續反抗的無意義，列寧說：「爲要拯救青年和蘇維埃共和國還未鞏固，應接受德國軍閥的要求。如果俄國在德軍攻擊下崩潰了，那對西方革命發生的每一個希望，也要埋葬。現今放棄的土地，不會永久失去，爲要獲得時間必須放棄空間」。（原引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他的著名呼籲，德文《選集》一九五一年柏林版，頁 352。轉引自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60。）起先布哈林佔優勢，後來因德軍步步逼近，列寧以七票對六票，取得中委會同意接受德國條件。列寧預料東方的和平會使西方繼續戰爭，這有利於世界革命的目的與發展，並可以保護俄國的國家安全。關於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所換來的和平，使得黨內造成嚴重分歧。布哈林的反對派，本質上是由意識型態影響而不願對政治現實讓步的理論家構成。對於這群人而言，革命信念的不妥協性是萬事之本，他們是左派反對派的先驅。社會革命黨左派反對這一合約，其意義是十月革命的聯合政權自此瓦解，其政府變爲單一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所控制。參考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56-62（台北：文星出版社印行，民國四十八年）。

<sup>10</sup> 俄國內戰，自一九一八年春季開始至一九二一年止，約達三年之久，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俄國沙皇時代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與後來的政黨問題。它的過程受到同盟國干涉的影響而變得更爲複雜。在這場內戰裡，布爾什維克稱爲「紅軍」（the Reds），其不團結的對手則稱爲「白軍」（the Whites），後者在政治譜系上包括從社會主義革命黨（SRs）到保皇黨的成員，因爲其成員成分複雜，政治理想分歧，使其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並不團結。內戰的主要政黨問題是，立憲民主黨人與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布爾什維克所發動的政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視爲一種竊權者的政權，因爲他們無視於人民的代表。內戰的主要社會問題是農民的消極抵抗，尤其是富農對於階級鬥爭與平均分配的口號甚爲不滿。內戰最重要的因素則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分爲史達林與布哈林兩派。前者認爲，凡受到沙皇壓制的民族，都有權選擇留在俄羅斯聯邦或分離。但是，這卻與傳統俄羅

未止，軍隊組織鬆散、社會秩序混亂、民心低落且渴求和平，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爲，應盡快使俄國退出戰爭，但蘇共領導階層卻在對外政策上發生爭論。列寧主張立即終止與德國的敵對狀態，以維持俄國革命的成果；托洛斯基主張拒絕德國要求，不簽訂和約，左派則認爲應對德國發動「神聖戰爭」，各派意見最後同意以托洛斯基的「不戰不和」以拖延時間，企圖激起德國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德軍在大舉進攻下，蘇共恐慌，被迫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vosk）<sup>12</sup>，使俄國獲

斯的理念相反，甚至使得俄羅斯四分五裂，再加上同盟國在旁煽風點火，使得帝國分裂爲諸民族的獨立體，所有種族集團將致力於從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解脫。再加上捷克軍隊復員問題與烏克蘭爭取獨立問題相結合，使得他們拒絕交出武器，而以武力爲後盾，結合各類不同訴求的反對份子以反對布爾什維克。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內戰結束。白軍失敗。其失敗的原因很複雜，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們對於未來沒有一個建設性的政綱，沒有反映人民與社會的要求。再加上當時人心厭戰與俄國人民愛國主義被激發，使他們沒有一個有力的理論去合法化他們的軍事行動。參考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63-99。參考李邁先，《俄國史（下冊）》，頁 95。

<sup>11</sup> 俄羅斯私自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vosk）而片面停戰。從表面看來，似乎同盟國現在應忽視東方的發展而集中他們的力量應付德國，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俄國港口，謀爾曼司克（Murmansk）、阿爾和格爾司克（Archangelsk）和海參威都儲藏供給俄國前線用的軍械和彈藥，在波羅的海各國被佔領和德國登陸芬蘭之後，盟國深信德國將會進攻聖彼得堡和謀爾曼司克，同盟國因此害怕該地的軍需用品落入德國手中，但是同盟國還未明白德國與布爾什維克政權會合作到何等程度，同盟國也不願讓補充的軍需品落入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手。因此英國政府與後來的法國政府都應該要認爲出兵干涉俄國內戰。一九一八年三月，英軍在謀爾曼司克登陸。四月，日本派軍開入海參威。到當年末，在北俄羅斯的同盟國軍隊約一萬至一萬五千人，與密勒爾將軍指揮的白俄軍隊聯合起來，而組織反布爾什維克的白俄政府。西方國家在德國戰敗之後，對俄國有兩個政策。第一個政策即是把同盟國所有軍隊撤出俄國，而以間接協助方式幫助白俄。同盟國對於俄國內戰的干涉是一種災難，它使內戰的破壞與時間相對擴大與延長了。

值得注意的是，當協約國部隊退走時，他們破壞了烏克蘭大量的糧食和煙草，並將俄國的黑海艦隊大量徵發，使俄國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到很大的損失。參考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85。

<sup>12</sup> 依約，蘇俄把廣大的西部領土，包括烏克蘭及波羅的海各省割讓給德國，且必須使俄國復員，不准蘇俄在德國佔領地進行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活動。此約對俄國是個大災難，它使俄

得了「恥辱的和平」。這個條約使對蘇俄日後的對外政策影響深遠，它使蘇俄領袖們瞭解：軍事上的衰弱會招致外來的攻擊，不可以樂觀地依賴世界革命以鞏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有劇烈的矛盾，但他們會團結一致以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世界革命固然可以確保蘇俄國家安全，但是蘇共政權的存在，也是世界共產主義最後成功的先決條件<sup>13</sup>。

蘇聯內戰期間，同盟國支持白軍（反共者），希望恢復東線戰場，使俄國繼續參軍，以消耗德國的武力。一次大戰結束後，同盟國擔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蔓延歐洲，故未終止對俄國的軍事干預。軍事干預的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十四個國家，外國干預聲勢十分巨大<sup>14</sup>，與俄國的內戰互相呼應，後來蘇俄紅軍在愛國主義號召下，漸佔優勢，白軍則因內部不團結與外國干預者對復辟舊政體的興趣降低，而漸漸解除布爾什維克政權覆亡的危機。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與德國先後發生革命運動，皆未成功。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sup>15</sup>，旨在加速世界革命

國失去烏克蘭，等於失去最富裕的穀倉、煤礦和鐵礦，並使俄國面積減少到等於十六世紀的莫斯科公國。俄國損失領土百分之二十六，耕地百分之二十七，鐵路百分之二十六，紡織業百分之三十三，鋼鐵業百分之七十三和煤礦百分之七十五。後來當協約國擊敗德國後，蘇俄片面撕毀這個條約。

<sup>13</sup> E. H. Carr, 《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第三卷，p.57。

<sup>14</sup> 當時英國避免與布爾什維克軍隊直接接觸，只滿足於運送武器和軍火給白軍，法國在烏克蘭則較積極。在巴黎和會上，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贊同謹慎處理俄國問題，邱吉爾則坦白的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英國人民普遍厭戰，因此英國不會出兵協助白軍。法國福熙元帥則認為應該要積極干涉，以反布爾什維克的「十字軍」反俄。但是法國內閣並不支持元帥的主張。美國因為日本在東亞與太平洋地位的提升，如果再削弱俄國，將會對美國不利而反對該主張。至此，同盟國放棄積極的軍事干涉，而是以間接的援助，也就是供應軍火和道義的支持。

<sup>15</sup> 共產國際的成立，使得布爾什維克俄國明告外人：它是一切被壓迫殖民地民族核備剝削半殖民地世界的天生保護者。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強烈地攻擊西方各國的帝國主義，甚至質

的發展，蘇聯政府當局成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言人與決策者，但因匈牙利、德國、法國、波蘭等地的革命運動紛紛失敗，使得俄人對於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發生革命的希望漸漸冷卻。此後，蘇俄的對外政策的重點在維護俄共政權，改善國際地位，增進共產主義的影響與力量。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止，蘇聯的對外關係逐漸形成，在這段關係裡，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皆正式承認了蘇聯政府並與之建立了貿易關係（美國至一九三三年才承認），蘇聯終於突破外交孤立，躋身國際社會。簡言之，在這段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任務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打破外交孤立即為該時期初期的首要目標，其重點在西歐與遠東，特別是德國與中國<sup>16</sup>。德、蘇的外交關係自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簽訂的拉帕羅條約（Treaty Rapallo）<sup>17</sup>開始，該約是經濟與軍事密切

疑沙皇制俄國的帝國主義。共產國際的目的，即在代表布爾什維克政權廣播自己的口號與命令，自此時起，莫斯科有著奇異兩面性的外交手法。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當和幾個交戰國社會民主黨的愛國主義發生衝突時，列寧第一次在右翼社會主義者的第二國際演說必須成立第三國際。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四月提綱」中，他迫切地要求成立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由蘇維埃外交人民委員會齊采林發起，三月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只限於邀請國，他們的派選完全是偶然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開於彼得格勒），代表大會草擬一個計畫，企圖在每個國家設立秘密的共產主義中心，它們都是為無產革命而工作，並通過列寧的二十一條，它們變為要加入第三國際的所有共產黨之指導的拘束。原則上，它們要求嚴格的服務與紀律，激烈反對社會民主的觀念，準備在工會與軍隊上積極宣傳。後來各國共產黨的活動都必須與莫斯科總部密切配合，並強調必須服從總部的命令。參考佐爾格·萬·盧赫，鄭家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120。

<sup>16</sup> 本文著重蘇俄在國際社會的關係，波蘭、德國、法國、中國有關共產革命部分因不切合文章需求，故不論。

<sup>17</sup> 據 E. H. Carr 著《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所言，拉帕羅條約的結果，是俄德友好條約，依此約：一、雙方取消賠款，二、德國取消布列司特·立托夫斯克的六十億賠款和在俄私人財產的賠償，俄國也放棄對德國的全部財政要求，三、恢復外交關係，四、在相互貿易關係各受特別優待，五、雙方對於所有重要國際協定

合作之始，也是蘇聯首次外交勝利。該約不僅結束了蘇俄外交孤立的形勢，確保其國家安全，免遭西方國家圍攻之虞，而且也獲得德國大量的工業與軍事技術協助，一九二五年，蘇聯與德國簽署貿易經濟條約，該條約成爲日後蘇聯與「資本主義」陣營簽訂該類條約的藍本。同年，法、英、得等簽訂羅加諾條約（The Locarno Treaty），於是德國對外關係隨之轉變，與西方及蘇聯同時保持友好關係。德國爲了使蘇聯安心，在一九二六年四月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在此期間，蘇、英關係惡化，原因是蘇聯在英國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煽動，而使得英國在一九二七年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在這時期後期，蘇聯標榜和平政策，雖非國際聯盟成員國，但經常參加國聯所支持的幾個委員會，努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背地裡使第三國際採取強硬路線，把保衛蘇聯列爲「國際無產階級」的主要責任；在國內，則是加強「一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與理論建構。一九三一年以後，蘇聯因不能與美國、英國、法國擴大貿易與取得貸款，逐漸傾向德國。但因希特勒（A. Hitler）<sup>18</sup>的崛起與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使蘇聯的國家安全受到隱憂，迫使蘇聯投靠至西方國家，追求集體安全，與鄰邦簽訂一系列的互不侵犯條約。

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蘇聯面臨德國與日本雙面夾擊的軍事威脅，其對外政策重點以「集體安全」爲中心，以友善態度親近西方國家，並迅速與西歐與東歐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網絡，努力改善與擴張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其中尤以與東歐各國的條約最爲重要，其動機一是鑑

要預先相互協商。此約的訂立，是因爲德蘇皆不信任西方國家。就德國而言，拉帕羅的意義，只是在俄國弱而沒有危險時，保持在東西兩方間的獨立。對於蘇俄，拉帕羅條約只是進入國際外交政治中的一個手段。

<sup>18</sup> 希特勒崛起的因素很多，在此不贅述。希特勒的政策，開始目的在於重建德國霸權和改變凡爾賽和約以來的既定的德國邊境，這種強烈的擴張主義被蘇聯視爲威脅，尤其是伴隨著加強的意識型態鬥爭和反共產主義的呼籲宣傳，更使蘇聯有理由相信希特勒的攻擊目標是蘇聯而非英、法。

於日本侵略東亞，使蘇聯東方造成緊張，簽訂和約可以保護蘇聯後方，二是德國的威脅可以藉由與東歐各國簽訂互不侵犯和約而減低，並使莫斯科與邊境各國建立相互聯繫的安全條約體系，使蘇俄與德國之間建立一道緩衝區以爲預防，希望透過集體安全以避免德國的攻擊。一九三九年，由於蘇聯與西方長期對立和敵視以及不同的對外利益，彼此間缺乏應有的信任與誠意，蘇聯因慕尼黑協定（一九三八年）而懷疑英、法等國故意促使德國向東擴張<sup>19</sup>，於是其外交政策由「集體安全」轉向「一國自保」，因而謀求與德國簽訂和約，保障其國家安全，拋開意識型態的歧異，蘇、德兩國的外交關係，尤以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sup>20</sup>爲一特殊點，此條約明爲兩國之間互不侵犯，暗爲兩者對彼

<sup>19</sup> 從地理環境來看，德國所處的位置較英法等國更能攻擊蘇俄。有鑑於羅加諾公約只保護德國西疆而忽略東界的作法，蘇俄開始懷疑英法可能唆使德國向東發展。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的各種主張：德國負有反共的責任、反猶太主義、以擴張民族生存空間而向東侵略（蘇俄），使德國的工業可以與東方的原料糧食相配合，使德國復興而與英法爭奪世界霸權。

<sup>20</sup>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條約（公開部分）片段如下：

第一條：締約雙方同意不從事任何暴力行為、任何侵略行動、與對某方的任何攻擊，不論是個別的或與其他強權聯合。

第二條：締約一方如果成爲第三強權作戰行為的對象，另一方絕對不得支持該第三強權。

第四條：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參與旨在直接或間接針對另一方的任何強權集團。

第五條：兩國之間的糾紛都應該透過「友善交換意見」或者透過仲裁來解決。條約將要維持十年；如在預定期限到期之前一年，雙方都未放棄，條件將自動延長五年。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秘密附加草約之情況與細節如下：

雙方簽署的全權代表在嚴格機密談話中，討論其在東歐的各自的勢力範圍的疆界問題。這些談話產生下述的結論：

1. 關於屬於波羅的海諸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地區的領土與政治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北部邊界將代表德國與蘇聯的勢力範圍的疆

此關係轉向猜忌備戰的虛假外衣<sup>21</sup>。而一九三九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使得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們紛紛跌破眼鏡，因為德蘇兩國在意識型態上是互相敵對的，<sup>22</sup> 因此，此約之簽訂是蘇聯以國家利益至上的考量才產生的，是爲了追求國家安全，爲了延緩德國侵略時間與爭取時間以動員蘇俄國內外戰爭資源，而使蘇聯對彼此相異的意識型態做一讓步。但是由於德、蘇國家利益相衝突（波羅的海的控制權與兩國對波蘭、北歐國家的瓜分不均），使得蘇、德之間的戰爭終究無法避免（一九四一年）。

界。在這方面，雙方承認立陶宛在維爾納地區的利益。

2. 關於屬於波蘭的地區的領土與政治的重新安排，德國與蘇聯的勢力範圍大致以將以納魯河（Narew）、維斯杜拉和（Vistula）、桑河（San）為界。至於維持獨立的波蘭是否符合雙方的利益，以及如何劃定這個國家的疆界，則視進一步的政治發展來做明確的決定。

4. 這份草約應由雙方嚴格保密。

<sup>21</sup>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是二十世紀外交史上重要事件，過去學者，如美國學者藍格(William L. Langer)與格里遜(S. Everett Gleason)所著《對孤立的挑戰(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此書對1939年的英法俄交涉與德俄交涉有詳盡的討論，認爲前者如成功則可能防止戰爭，後者成功則帶來戰爭，並且認爲一九三九年的德蘇協定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關係密切，希特勒視此協定爲進軍波蘭的「空白支票」，爲此他不惜放棄自己的反共立場(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這些檔案顯示出德蘇協定與希特勒侵入波蘭的關係，也就是此一協定成爲德國發動戰爭的放行燈號。

有些學者根據《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此檔案爲蘇俄外交部所用來宣稱英法領袖在1930年代，預謀而非誤失，以求安撫希特勒侵略野心，而俄國則在與納粹簽訂協定之前，曾一再希望達成遏止希特勒侵略的集體安全體系，蘇聯企圖用這些出版品證明希特勒之所以膽敢發動侵略，是因爲他相信西方國家不僅不會制止他，而且會鼓勵他向東發展以俄國衝突。富萊明(D. F. Fleming)，《冷戰及其淵源》(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1917-1960)，認爲德蘇協定並無關於戰爭爆發而是英法的姑息政策使得希特勒勇於發動戰爭。

<sup>22</sup>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者皆因歐洲危機而產生。法西斯可說是共產主義的某種反作用。因此，不少社會學家把他們當做是雙胞胎的兄弟，例如：亞倫特(Hannah Arendt)認爲兩者是同一現象的兩面，本質上兩者都是極端主義的。社會成員原子化之後，「大眾」社會

### 三、蘇維埃意識型態之轉變

在討論蘇聯的外交政策之前，我們必須先分析列寧及其同僚的意見，以認清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思想基礎，尤其要明瞭他們的態度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們有何不同的地方。史達林主義並非如西方集權主義(totalism)史觀者所說的，是俄羅斯革命理念預設路程的頂點。簡單說，列寧主義的象徵是在於列寧的早期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二〇年代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運動和體制，而史達林主義則是三〇年代以後共產主義的思想、運動和體制。在本文所提到的「列寧主義」，即是將馬克思、列寧

逐漸形成，極權主義正是這種社會的後果，其原因，在德國是由於戰敗以及經濟危機，而在俄羅斯則因沙皇派引來的災禍及大革命。「大眾」是由彼此毫無關聯的個體所組成；他們自覺是一盤散沙，絕望，受辱。極權主義向他們推薦某種思想，富有想像力的號召把他們引入歧途；對現實不滿，也沒什麼家世，前途更加茫茫，一旦投入極權者的神話世界，不但無力自拔，更拜倒在全能與無所不知的英明領袖的膝下，如有需要，不惜赴湯蹈火。有些時機，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可以達成協議，成立「客觀聯盟」對付共同的敵人，亦即自由民主制；施特拉色(Strasser)兄弟宣揚希特勒德國與共產蘇聯間應成立某種長期性協約，而因權宜問題，希特勒與史達林(Stalin)果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實現互不侵犯協定。希特勒有時會頌揚史達林，從而更進一步地向蘇聯建議與軸心國列強共同瓜分世界。

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從外面來看，兩者之間極爲神似：面對他人，自以爲優越，並且不屑於尋求他人的諒解；國家萬能，圖利單一政黨，權力上黨國不分；以恐怖手段處決異己；無所不在的警察；同一的國家主義，以強大的軍隊做爲支柱；同一領袖崇拜等等。事實上，在納粹主義與極端共產的史達林主義兩者之間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蘇維埃聯邦從事社會與經濟上的全面轉型，而納粹主義卻全力頌揚這些。法西斯主義堅拒無產階級「專政」；意圖以階級合作取代階級鬥爭；著手群眾運動，意在加以掌握而非推波助瀾；在蘇聯，以一種無秩序與無政府的狀況達成共產主義、表達「人民意志」的理論，法西斯主義對它全面譴責；對法西斯來講，共產主義擁有他所缺乏的不敗根基，照說應順理成章地走進民主，事後卻不准人民發言。反正，對希特勒的成見來說，再加上他的種族主義，共產主義應該是種來自野蠻亞洲的想法，當然要把它趕回亞洲。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皆有普遍化的傾向，事實上卻彼此相互排斥。

的思想體系、思維構造解體之後，依照政治需要或「權力」的正統化邏輯，而將其中的幾個「觀念」重新組合的、具有「國教」性質的意識型態。對於所謂「史達林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形成而言，一九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是具有決定性的轉捩點，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政治變動，是在一九二四年後蘇聯領導階層所發動的繼承內部鬥爭。普遍以為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基礎是馬克思主義，<sup>23</sup>但實際上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基礎是一個被修正過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與其同僚為使馬克思主義符合俄國現況，而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思想基礎並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被修改過的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列寧撰寫的小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6），為蘇維埃的外交政策提供重要意識型態基礎，一直以來就是蘇俄的官定主義。在這部小冊裡，列寧把馬克思主義調適於當前環境並加以全球化，指出资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持久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將因為追求原料、市場、與投資機會而不斷發生衝突，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會演變為帝國主義，不斷地因其國內商業需要而向外擴張，當向外擴張不足以滿足國內需求時，最後將在國內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並使資本主義崩潰。

在列寧的言論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理論，必須要按照現實需要而調整，調整過的理論才能夠符合俄國的現實情況，從列寧發表於一九

<sup>23</sup> 馬克思主義的三大要素：一、在一種以科學方法事前決定歷史路線的見解中，政治力量的運用和領導，只有那些瞭解科學方法的人們才能勝任，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勝利。二、在人文主義的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意義上說，達成某種民主的價值，將會自然地使社會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三、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切社會將會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再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在各個階段中政治權利是為統治階級而行使的；這種程序等到沒有階級的社會出現，而在國家消失的時候才停止。以上轉引自羅斯陶，《蘇俄社會動力之研究》，頁 5-6。

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的述論，是按照俄國國內情況而提出許多修正聲明：

恩格斯在談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時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經典性的論點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而忽視那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在那些關心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命運的人們中間，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然而誰都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的急劇變化異常迅速、異常劇烈地改變了形勢，改變了迫切地、直接地決定著行動條件，因而也決定著行動任務的社會政治形勢。

但是在這一時期，因為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迫切的直接行動的任務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這種異常劇烈的變化，既不是偶然的現象，也不單是「外界」壓力的結果。……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堅決地反對這種瓦解，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頑強的鬥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了。<sup>24</sup>

<sup>24</sup> 選自《列寧選集》中文版第3版第二卷，頁 278-282。

一九一八年列寧對於是否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的爭議中，他反駁黨中左翼派布哈林的論調，他把世界革命的利益與蘇聯本身的利益合一（與後來史達林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論調相近），在一九一八年的黨大會上說：

從世界全局歷史看來，如果蘇聯革命陷於孤立，如果他國革命不成功，我們的地位便絕望了。正為了有利世界革命和俄國復興，我們才屈辱媾和。倘若照布哈林同志的路線去做，我們便會把大好的革命斷送了。<sup>25</sup>

從以上引文來看，吾人可以知道列寧在此時已經認為革命成功前的「世界革命」理論不足以應付執政後的現實考慮，因此將理論轉向宣傳「蘇維埃是唯一成功的社會主義社會」，它的地位是岌岌可危、需要自保自存的，因此首要之務要保護蘇聯革命的成果，而保護蘇維埃即是保護「世界革命」成功的種子。從列寧所發表的文章之中，可以瞭解共產黨人的特色即是凡事皆要保持著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但是因為現實上的需要，或為了爭取權力，使他們不得不在理論上作事實的讓步，但又必須把事實架入理論的框架之中，使其成為主義的新詮釋，以符合所謂的「主義正確」。可是列寧在追求主義正確性的過程裡，從來就沒有把意識型態的本身當為應該追求的目的，而是把這樣追求的過程，視為獲得其他實際利益的一種手段。列寧深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窮歷史之變，認為革命運動必須要遵循著馬克思主義才能成功，所以他對一切重大決策，均可依據主義的觀點，找出

<sup>25</sup> 原出處不詳，轉引自穆爾（Barrington Moore Jr.），《蘇聯政治》，頁 131。該書原名是“*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採用陳伯莊的中譯本版。

符合當前現實環境的答案，因此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增加不少的新詮釋，修改或放棄了不少的原有說法。

在列寧死後，史達林繼續推陳出新地修改著原型的意識型態，「設問求答」<sup>26</sup>的作法依然保持著，設問法與答問法之間富有很大的伸縮性，答案紛然並列，使得蘇維埃的意識型態常隨著領導者的政治起伏而有所改變。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觀點主導了整個蘇維埃政府的行動，他把列寧的言論混合著部分傳統的理論組織其獨裁者的理論架構，換句話說，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把蘇聯內部的事件和他自己的政策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一國社會理論」的理論基礎，使得史達林的個人意志成為蘇維埃政府政策的決定方向。史達林為了合理化其在黨內的獨裁地位，史達林在一九三〇年的蘇俄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時，他說：

我們準備消除政府的存在，同時我們贊同加強無產階級的專政，到現在為止，無產階級專政是過去一切政府權力中最強大的一種，國家權威發展到最高峰，結果就是造成準備消除國家權威的條件：你們有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可以應用！<sup>27</sup>

以上引文說明，在史達林的想法裡，暴力與權力是一體兩面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其「黨獨裁」的掩護，其例亦可在史達林一九四〇年的一篇文章中發現：

<sup>26</sup> 所謂「設問求答」的意思，即是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提出當時環境的問題，以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或話語，對其問題加以合理化，從合理化的過程之中找到決定實際行動的答案。

<sup>27</sup> 原引自 C.B. Hoover, 'The Soviet State Fails to Wither', "Foreign Affairs", 載於一九五二年一月號。轉引自羅斯陶，《蘇俄社會動力之研究》，頁 97。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一種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包括武力的概念，如果再嚴格意義下去瞭解專政，沒有武力則沒有專政可言，列寧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下的界說：『直接以武力為基礎的國家權力』。因此，說到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的關係，並把它和無產階級相一致，那就等於說，關於他自己的階級，黨一定不僅是個領導，不僅是一個導師，而且是一個運用反對它的國家權力。<sup>28</sup>

在史達林進行一連串的內部鬥爭之後，他終於「完整」地獲取了共產黨和蘇聯政治的控制權，並使他自己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衣鉢的唯一繼承人，藉此「神聖」的代言人地位重新闡釋馬列主義，並將「一國社會主義」融入蘇維埃政府的政治理想與意識型態中，他進而在一九三九年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更明白地將「一國社會主義」做為蘇維埃政府的理論基礎，並將該理論做為蘇維埃政府施政的方針與原則，認為修正共產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將更能完善的表達馬克思主義的精華與真諦，並發展為其獨裁地位的合法基礎，以增強蘇聯的工業與軍事發展，並使蘇維埃政府的權力擴展到最大極限：

有時候有人問：『我們已經消滅了剝削的階級，在這個國家（俄國）將不再有任何敵對的階級；也沒有人壓迫了；因此不再需要政府；它應該消除。……難道還不是把國家的一切垃圾拋棄的時候嗎？』……是什麼東西促使這個問題被提出呢？……它之發生是由於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某些的主張方面沒有全部完成和不夠充分，它這樣的流行，原

<sup>28</sup> 引自 J. V. Stalin, "J. V. Stalin on Problems of Leninism", pp. 139.

因是由於我們對於國家論有關問題缺乏審慎的態度，……如果社會主義僅在一個國家勝利完全了，又如果它不可能由國際情況中孤立起來……那麼怎麼辦呢？恩格斯的公式（國家的消滅）不能對這個問題提供答案。……欲使推翻資本主義，它不僅需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權力，不僅需要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而且要完全摧毀資產階級的政府機構，它的舊式軍隊、它的官僚份子和警察力量，代之以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形式，是即是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知道的，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作法，但他不是說新的無產階級可以不保留舊國家的某些任務，要使之改變以適合無產階級國家的需要。……其實，我們國家的形式都在改變中，同時它會根據國內外局勢的發展而改變……除非資本主義的包圍被解除了，除非國外軍事攻擊的危險被消除了，……如果資本主義的包圍被打破和社會主義的包圍發生了，那麼國家它是不會被保存的，而且它會萎縮的。<sup>29</sup>

從這段引文中看到，史達林不僅把馬克思主義的政府觀念改變為適應蘇維埃的官僚體系，而且把蘇維埃社會文化生活的整個模型加以改造，包括它的行動價值標準也從「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被轉變為以蘇聯國家利益為主的「一國社會主義」。他對資本主義總危機論點成了「世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把資本主義與經濟危機和戰爭劃上等號。史達林很明顯的把他自己和蘇維埃政府當作是「歷史客觀」條件的創造者與動力，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國家觀念的信仰由馬克思的「政府必然消滅論」轉移到

<sup>29</sup> 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轉引自羅斯陶，《蘇俄社會動力之研究》，頁97。

黑格爾「政府為唯一權力體」，並且一國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很明顯的從一九二〇年列寧所發表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以俄國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模範，以無產階級名義去奪取政權而加強黨組織，以及與資產階級國家妥協以換取機會是必要的觀念擴展而來的<sup>30</sup>。換言之，史達

<sup>30</sup>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所發表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由國家出版社印成單行本。選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9卷。引文中可以看到列寧對於布爾什維克黨人應該要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下，對於眼前的現實狀況作一適當的「妥協」，並認為「妥協」是一種達到世界革命目的的手段，以下為引文節錄（本段引文過長，本不適合放在註解中，但因基於文章流暢性而無法安插於內文中）：

俄國這一模範向所有國家展示了它們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發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極重大的事情。……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國際的「意義」（按狹義來說）。第二國際的「革命」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地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們成了反動分子，成了最壞的機會主義和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的辯護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由於資產階級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資產階級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和意志統一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經驗向那些不善於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左派共產主義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這一年就已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原來認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這種妥協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恰恰是必要的。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麼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於當真對待的孩子氣。一個政治家要想有益於革命無產階級，正是應當善於辨別出那種不能容許的、蘊涵著機會主義和叛賣行為的具體的妥協，並善於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判，猛烈地進行無情的揭露和不調和的鬥爭，決不容許那班老於世故的「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和老姦巨滑的議員用泛談「一般的妥協」來推卸和逃避責任。……應當善於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但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打一張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證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中

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並非憑空捏造，而是繼承列寧主義的某部分觀點與蘇聯當時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的。維護蘇聯安全便成為史達林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目的，雖然「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並未放棄，但它在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世界革命」必須要符合並且促進蘇聯的安全利益，政治理想成為政治行為的附屬品，並且改由共產國際去執行「世界革命」。蘇維埃政府把「世界革命」的目的和手段加以劃分，以「世界革命」目標的名義去建立蘇俄國家權力、蘇維埃政府權威與蘇維埃的安全體系。在史達林紀念列寧逝世的十六週年大會裡（一九四〇年），他說：「把世界革命當作一項統一的行動，那是瞎說。世界革命是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國家裡發生的。紅軍的行動，也是世界革命的事業。」<sup>31</sup>，由此可以看出，史達林不再把世界革命看做是世界範圍內同時發生和同時取得勝利的整體性革命，而是將世界革命視為可以在不同國家先後發生的分散性革命。

總之，蘇維埃政權的意識型態並非如原型的馬克思主義，它漸漸變化為民族主義、國家官僚結構性強烈、為適應現實的改變而加以修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它已經變型成為蘇維埃政權提供合理化基礎的意識型態。

### 三、「一國社會主義」與「不斷革命」的爭論

史達林所主導的蘇俄政策和初期革命的目標相違背是很明顯的，在一國社會主義成為蘇維埃官方主要意識型態的過程中難免受到傳統派的質疑與阻

不會遇到任何困難和任何錯綜複雜的情況，那他簡直就是一個江湖騙子。

<sup>31</sup> 原引為季米特洛夫日記，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轉引自張盛發，《史達林與冷戰（1945～1953年）》，頁30。

礙，因此當列寧死後，布爾什維克黨黨內立刻激起了傳統派與修正派對於理論的爭辯，而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充滿意識型態的激烈辯論中，實質上代表著蘇聯內部權力分配的衝突，蘇維埃政府日後將走上何種路線的矛盾，以及蘇維埃政權對於政治理念的轉變，而蘇聯內部意識型態與政策的轉變將會大大地影響其對外的態度與政策。因此本文可以視為第三章的延續討論，必須將蘇聯內部對於意識型態的爭鬥作一分析，以試圖釐清蘇聯內部的意識型態主流為何。

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蘇聯領導層內部與意識型態發生嚴重的分裂與鬥爭，一派以托洛斯基為首，主張「不斷革命論」(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的馬列主義傳統派，一派則為史達林為首，主張「一國社會主義論」(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官僚統治派觀點。之所以會有理論上的爭論，是因為列寧生前對於俄國革命有不同見解，在一九一七年，他認為俄國社會革命成功的前提，是繼續國際的擴張，認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世界規模下才會成功，但是隨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失敗的打擊之下，列寧改變其理論，認為國家的長期過渡期（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最終會死亡毀滅）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策動革命的失敗使得列寧把社會主義的發展侷限於蘇維埃聯盟本身。因此在列寧死後，繼承列寧新理論的人似乎代表著可以繼承列寧死後所遺留的政治地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是史達林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提出的，它的目的原本在打擊「舊社會」的意識型態，也就是要打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並企圖貶低其政治地位。換言之，「一國社會主義論」之興起與蘇聯內部權力鬥爭有關，並因其國內左右派系之衝突而修改的意識型態理論。

一九二四年時，蘇聯共產黨內部分為左右兩派。左派為托洛斯基 (L. D. Trotsky, 1870-1940)、季諾維也夫 (G. Y. Zinoviev, 1883-1936)、卡米涅夫 (L. B. Kamenev, 1883-1936)，右派則為李科夫 (A. I. Rykov, 1881-1938)、布哈林 (N. I. Bukharin, 1888-1938)、湯姆斯基 (M. P. Tomsky,

1890-1936) 等人。史達林拉攏右派攻擊左派，再勾結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分化左派、孤立托洛斯基，以謀取德蘇共內部的領導地位。對於世界性社會革命的理論，托洛斯基與史達林持不同的意見。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論點，是認為：「整個世界經濟，首先是全歐洲的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已是充分地成熟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以進到社會主義—以何種速度和經過什麼階段—這與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往後的命運有密切的聯繫」<sup>32</sup>，其意思即為僅一個國家實行世界革命必不能持久，主張放棄世界性社會革命無疑是自取滅亡，環繞蘇聯的國家都是反共國家，如果僅蘇聯一國實行社會革命將無法支持，主張利用共產國際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來推動國外的革命，認為革命後的俄國其社會主義的實現，完全賴於西歐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史達林則主張先建設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一國社會主義論），優先解決蘇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了，才能進一步策動世界性的社會革命。「以蘇俄本身利益為優先」的態度可從下面的引語中，有一清楚表現：

目的在於鞏固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它作為推翻一切國家帝國主義的基地，革命的擴展不限於一個國家；世界革命的新世紀已經開始了。……世界革命的真正發展……將是更快而更徹底的，更徹底的社會主義加強它自己在第一個勝利國家的地位，加速這個國家變成為進一步推動世界個命的基地，變成為進一步分裂帝國主義的杆桿。……這是真的，第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如果使它擴展，非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同樣也是真的，

<sup>32</sup>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 5.

世界革命的發展將更為迅速和徹底，更有的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所有其他國家勞工的援助。<sup>33</sup>

史達林認為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會引起群眾對共產政權的懷疑，因為世界革命的遠景越來越小，黨內同志的士氣也會因不斷等待、失望而低落。史達林對「不斷革命論」提出質疑，「難道俄國革命的命運，決定於國外共產主義的地位嗎？難道一個人暫時不滿足於建立俄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嗎？」<sup>34</sup>左右兩派的筆戰十分激烈，其結果就是使受托洛斯基攻擊的季諾維也夫與卡米涅夫以及托洛斯基失去其領導地位，換言之，在這些論爭有助於史達林在三巨頭（季諾維也夫、卡米涅夫與史達林在列寧死後接掌權力，稱為三巨頭）中確立其領袖地位<sup>35</sup>。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偶然的發展的，它剛開始只是用作鬥爭的工具，是為了掩飾共產國際在國外策動的失敗，並且要推翻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而產生，雖然史達林的成功奪權並不完全是在理論層面的優越，但是由於蘇共最上層機構依然是一個理論的社會，同時它的工作推動仍是以投票為依據，因此史達林必須要有一種理論以表明其政治立場，而且必須把它表現為繼續遵照列寧遺教而形成的理論，解釋為什麼民族國家不僅在共產主義下沒有消失反而更為強化，以作為在一個國家內推行社會主義和反對世界革命的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史達林並未否定「世界革命」的目標，只是他將「世界革命」當作革命的最後目標，蘇維埃本國的建設與安全才是蘇維埃政府之首要之務。

<sup>33</sup> 原引自 *Historicus*, "Stalin on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載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號。轉引自羅斯陶，《蘇俄社會動力之研究》，頁 93。

<sup>34</sup> 本出於史達林全集第七卷第二十一頁。轉引自佐爾格·萬·盧赫，鄭學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頁 138。

<sup>35</sup> 參考王季平、陳幻合編，《蘇聯黨爭文獻》（上海：新生命書局，民二十二年）。

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之所以抬頭，是因為其理論符合當時蘇聯社會發展有關，當時蘇聯在新經濟政策實行處於理論的矛盾之中，「一國社會主義」與「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問題就表現在兩個重點上：一是農民問題，一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之所以提出農民問題，是為了在打擊「不斷革命論」的國際主義後，再回到建立社會經濟建設問題時，勢必要以國家權力對富農進行剝奪，建立民族社會主義經濟。<sup>36</sup>當時蘇聯要求即是在短期達到西方國家的水準，而要在短期完成蘇聯富國強兵的目標，最簡單的辦法即是以國家的干涉去解決急速集體化與工業化此兩大難題，由於運用的手段與原本官方理論（不斷革命論）不和諧，因此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將可以是國家機構（黨）提到最高度，給予發展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合理性，如此才能將俄國官僚政治的傾向模糊，而以現實主義的目的出現，修正馬列理論裡充滿世界革命意識型態的「不斷革命論」，並將官方理論改變為以國家利益為上的「一國社會主義論」。從蘇俄政治理想的轉變，吾人以為蘇俄政權很明顯地已經放棄了支持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政策目標（不斷革命論），蘇聯已有系統地走向一種以維持和擴大國家權力為本的政策（一國社會主義），變成了它在任何政治行動過程中唯一的準則。在追求國家權力的過程，尤其在追求對抗西方國家的力量上，有它源於自身的特殊概念與政治理想，它訴諸民族主義的象徵和蘇俄社會價值的傾向十分明顯，對於國家及國家領袖反覆的稱頌諂媚，並且將把民眾置於西方國家侵略意圖的威脅下，使得蘇聯對西方國家的各種行動有著病態性的仇視與歧視。

自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原有蘇維埃政治理想的主要目標（世界革命）漸漸地隱晦了，蘇維埃領導人一再地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世界觀，並將

<sup>36</sup> 陳璋津，《俄國革命的性質》，頁 266。

修訂後的理論作為一種追求政治獨裁權利的理論基礎，使得蘇俄政權也和其他集權國家一樣，尋求個人行使政治權利作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根本轉變的方法，把馬克思的理論加以曲解，但是，蘇俄政權需要在表面上維持馬克思理想的繼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想的典範依然保留在蘇俄的社會裡，因為它使國家機器與民眾之間有了一種共同的字彙與意識型態，使它不得不遭逢到政治理想概念與現實政治需求相互矛盾的問題。雖然做了重大的修改（一國社會主義），但馬克思主義仍遺留著價值象徵，蘇聯也繼續運用該典範以維護它的政治政策，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已被侵奪其原有的完整性，被黨國獨裁體制的統治者化約成其統治「合理化」的基礎，使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合法性和社會道德容許的理論基礎。吾人以為，就蘇聯歷史的階段來看，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不同階段裡使「馬列主義」發揮不同的作用，事實上，「一國社會主義論」使得蘇俄社會中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思主義）與過去沙皇時代的合法性（民族主義與專制權力）結合在一起，蘇維埃領導人修正馬克思主義（原型）是為了符合對獨裁權力的追求，這種新政治理想已經在本質目標和經濟理想上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而僅是維持為合法而修改過的主義形式，甚至更進一步地，蘇俄政權運用意識型態式字彙與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以觀察世界的局勢，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列主義）可以因為外在特殊環境和問題而做適度的改變。總之，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隨時都拿正式的理論作現實上情勢變化的掩護，而這也是蘇聯其對外政策隱晦其國家利益至上要求的一種外交手法。

#### 四、蘇聯內部政治與外交政策之關係

一九四一年以前的蘇維埃外交政策，不斷地在追求「世界革命」與保護「國家利益」兩個目標上衝突，概括來說，列寧時期和史達林時期的「世界革命」理想區別在於：列寧時期推動「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寧的理論和指示為基礎，其特點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場雖有先後但卻是迅速得

勝的整體性革命，因此其重點擺在策動他國國內的社會革命活動上，在實踐上表現為對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直接進攻」的策略，對西方國家擺出敵對的姿態與孤立國際社會政策。史達林時期推動「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史達林的理論與指示為指導，其特點則是「一國社會主義」，使蘇聯的安全利益考量優於「世界革命」的理想，放棄了其速勝的觀點，也就是不在謀求短期內取得「世界革命」勝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做一個長期的目標，在實踐上表現為對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一種尋找和利用彼此間矛盾，換言之，史達林時期的外交政策，即是將意識型態的敵對轉為國際均勢的平衡政策。由第三章與第四章的分析，吾人得知，蘇俄對外政策受到蘇俄對內政策中行使權力的同一經驗標準所支配，所謂的「同一經驗標準」就是現實政治。十月革命不久後，俄國的傳統概念和蘇維埃政權在歷史環境上的困境常常發生矛盾與兩難的爭鬥，從二戰前蘇聯的對外關係史來看，革命成功初期時，列寧與托洛斯基力圖在國外推動革命，以免世界資本主義先會摧毀蘇聯。他們認為德國國內的革命時機似乎成熟，而共產國際的領袖也認為德國必然會發生革命，若要干涉德國革命勢必投入蘇聯的資源以助其外國共產黨人，但是這與保護蘇聯自身政權的目標矛盾，因為當時蘇聯的軍事力量軟弱，無力抗衡外國入侵，為求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和平，不惜犧牲德國共產黨，違背其「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後來甚至轉而與德國政府合作（拉帕羅條約，一九二二年），防止反蘇聯合出現，發展自身軍事與經濟力量。總之，列寧（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作了一連串的外交決策，外交決策受到現實的國家安全與政治權力之考慮而被支配，以自保自存為第一，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vosk）的簽訂背景來看，列寧認清當時德國革命必然失敗，於是力主接受條件，駁斥黨內外的反對，與德國簽訂和約。他說：「我們將來總

要見到世界革命的，但這時候它只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神仙故事。我也知道兒童們是愛聽神仙故事的。」<sup>37</sup>列寧在「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與「國家利益」的自保策略兩者間，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自保，在實際行動上，既以自保為第一優先，政治理想便得要修改，使其政治行動合理化，並且使反對派（布哈林等人）失去立論基礎。

史達林執政之後，史達林所做的事情和以前的列寧一樣，目的與手段是分離的，表面上是說為了世界革命的目的，但他用的手段完全以蘇俄的需要作為絕對優先的措施。對於那些國內外希望繼續進行世界革命的共產黨份子，史達林以「時機尚未成熟」一詞加以反對，認為應該加強蘇聯的力量以做為其他地方將來革命的基地，而非是傾蘇聯的國力去幫助他國共產份子的奪權，史達林對外政策中的「一國社會主義」就是為了追求「一國安全」的目的，就是要維護和確保蘇聯安全，它要求拒戰爭於蘇聯國門之外，建立一國安全，而不是集體安全。以下列兩事件最為妥貼來說明蘇維埃對於「世界革命」的理想漸淡，最關切的已非他國的革命成果，而是以「一國社會主義」的原則，保護蘇維埃自身的國家利益為優先，例如：一九二三年德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的時候，蘇俄對之並不給予熱烈的支持；又例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也因莫斯科的領導而遭到國民政府清黨屠殺的境地，蘇聯並未對中共施予援手，反以因畏懼日本侵略其在遠東之基地而與國民政府復交。例如：一九四三年史達林為獲得英、美信任而將共產國際解散。在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蘇聯利用「世界革命」作為一種理論基礎，使將東歐各國納入其共產體系中，卻又以「一國社會主義」使他國的附庸黨派、東歐各國政府和西方共產黨只能以蘇聯利益為重，處於受莫斯科完全控制下的附庸地位。但是蘇聯淡化政治理想並不代表其放棄「世界革命」的理

<sup>37</sup> 原出處不詳，轉引自穆爾（Barrington Moore Jr.），《蘇聯政治》，頁130。該書原名是“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採用陳伯莊的中譯本版。

論與理想，無論是解散共產國際或者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這些對外關係只是基於國家利益需要而採取的暫時退卻手段與方法。

總之，在研究蘇聯對外政策時，若想在「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兩者之間確定一個比例是不可能的。官方文件顯示，自列寧以來的蘇聯領袖皆以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始終重視「世界革命」；另一方面，蘇聯的政策莫不以保衛與增進蘇聯國家安全與利益為其主要使命。他們對於世界革命與一國安全互不相容的兩難問題，經由一系列意識型態爭議（伴隨著內部的權力分配與爭鬥）之後，轉為保衛蘇聯即為進行世界革命的正確路線之說，並且將世界革命理想的實現推到不可預知的長期性目標。蘇維埃政權巧妙地把兩者統一起來，把蘇聯描繪成世界革命的中心與領導力量，因此保衛蘇聯的利益，就是保衛世界革命的利益。實際上，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與組織備用來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效勞。由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推知，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一切以維持蘇聯本國安全與利益為主，所不同的是，在運用國際外交均勢的原則之中，蘇聯秉持著無產階級專政的「世界革命」觀，對其外交手法大作意識型態的宣傳，並且把他們在國際外交中的種種協調與讓步，視為「世界革命」策略上的暫時性退卻。

## 五、結論

蘇俄以馬克思主義為立國的基礎，倡導階級鬥爭及世界革命，自成立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意識型態的危險性甚為恐懼。本文在三、四、五章以大量文件與言語的引述，以試圖證明蘇聯意識型態的改變（馬列主義）與其意識型態的本質（一國社會主義），使得其對外政策受到意識型態的影響（世界革命）並非如西方國家所想像的具威脅性，當然吾人不是絕對地認為意識型態在蘇聯對外政策上只是幌子而已，而是相對性地以為意識型態並非完全主導蘇聯對外政策的態度與作法，自史達林之後的蘇聯領導人在意識型態與其國家利益相符合時，即會大肆宣傳其馬列主義理念，以增加他們在外交會議上的談判籌碼，當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不符合時，大多以不公開方式處理國際事務（例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大致而言，蘇聯的外交政策主要目的是保證蘇聯本國的安全，在執行上也與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及民主國家相似，不過有下列幾個重要相異之處，即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特殊性：

1. 蘇聯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一樣，必須保持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基礎，若是沒有阻礙到「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與「維持蘇維埃權力」兩大要素時，即可將馬列主義的「世界革命」拿出來加以宣傳；若是有所阻礙使，他們就會在理論上作妥協與讓步，把事實架入理論的框架之中，使其成為主義的新詮釋，以符合所謂的「主義正確」。
2. 蘇聯由於其意識型態的本質與對內政策的需要，使蘇聯處於敵視西方資本主義及民主國家國家的地位上，它的基本目標是為了保護它對國內社會的控制與國家安全，同時在意識型態的宣傳上以侵略性政策為向外擴張的動力，因此，蘇聯以「敵視西方」為凝聚國內民心之意圖與手段。

原出處不詳，轉引自穆爾(Barrington Moore Jr.)《蘇聯政治》，頁130。該書原名為“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採用陳伯莊的中譯本。

3. 「一國社會主義」一方面符合蘇聯國內對民族主義的需要，另一面又為其對外擴張的合理性基礎，藉此蘇聯可以維持對國外共產黨的直接控制權，並且在理論基礎上操縱他們的政策，以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

4. 蘇聯的意識型態因現實需要與國家利益而有所伸縮性，但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維持蘇聯本國的安全，次要才是追求「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兩者之間隨著當時環境需要而有所交替。